

我始终认为,中华的早期文化是青铜文化,因为青铜的发展要先于瓷。中国是瓷之故乡,这一点毋庸置疑,商代中期,也就是公元前16世纪,华夏大地已经出现了瓷器,可惜这个时期瓷器传世不多,且出土多是粗瓷和陶器。青铜器就不一样了,青铜器最早出现在夏朝,是夏商周文化的核心要素,青铜器不仅尊为王侯礼器,而且已经进入贵族家庭成为实用器具。青铜文化在西周晚期达到了顶峰,而瓷器直到宋代才真正成熟,以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著称于世。当然,瓷后来居上,势头盖过了铜,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。

我对铜感兴趣,源自家里的两只青铜爵。我家当时在胶东即墨县田横镇,一个“人家犹有古风存”的古老村落,村里春节祭祖庄严隆重,即或在上个世纪70年代,祭祖之风也未能禁绝。春节临近,家族祭祖的主场设在我大伯家。大伯父会支起梯子,从天棚上取下油布包好的家谱、牌位、香炉、烛台、青铜爵等等,恭恭敬敬地将家谱挂在墙上,家谱下面安放供桌,铺上大红台布,摆好香炉、烛台、青铜爵等,供家人依次叩头祭拜。因为烛光暗淡,家谱上先祖的画像又面目凛然,少年的我便有些战战兢兢,大气都不敢出。说来奇怪,当叩首后抬头看到那两只盛满米酒的青铜爵时,心里会生出一丝亲切感,因为我家中案上也有同样的两只。两只露出自哪个朝代没有印象,当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,无法给文物断代。后来因为屡次搬家,那两只传世的青铜爵不知所终,成了我心头无法弥补的遗憾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物价格低廉,造假之风未起,老宅里这两只青铜爵是真品无疑,要是不遗失的话一定会被我尊为至宝。

因为有青铜情结,每到一地我总会关注铜器,探寻一下城与铜的关联。我想,沈阳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不可能与铜无缘,我看过许多辽金时期的铜镜,做工非常精美,辽国六府皆有工匠可制。沈阳历史悠久,从战国时期的候城、辽金的沈州,到元代沈阳路,明代沈阳中卫,再到后来的盛京、奉天,这样一处东北旺地,从大家闺秀到小家碧玉,至少离不开铜镜吧,但因缺少史料,沈阳的铜缘我只能追溯到沈阳中卫。据《辽宁通史》记载:“永乐九年,沈阳中卫有局造匠人69名,生产了196台佛郎机。”佛郎机作为仿制葡萄牙的速射铁炮,由炮管、炮膛和子炮组成,沈阳中卫的工匠曾尝试用铜来铸造子炮。在翻阅清代盛京地图的过程中,我惊喜地发现城中心地段竟然有一条铜行胡同,正是铜行胡同这个地名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。在了解了这条胡同的来龙去脉后,我觉得应该打捞并修复这段被时光淹没的城市记忆。



忆,因为铜行胡同不仅是沈阳工匠精神之滥觞,这里还静默着沈阳民俗文化之密码,铜行胡同就像一条铜纽带,将这座城市的百年历史串连成一幅生动的铜雕。

铜行胡同又称铜行里,与沈阳故宫毗邻,长约百步,宽不过八步,南始沈阳城的原点中心庙,北通沈阳最繁华的四平街,据说在清中晚期,这里锻造铜器之声响彻昼夜,店铺生意红红火火,众多堂号出品的火锅盆碗、鞭钩把手、首饰环锁、香炉烛台、锣镲管号、神像吉兽,可谓应有尽有,知名度堪比北京的琉璃厂。铜行胡同的名字与盛京城扩建有关,1625年,努尔哈赤从辽阳迁都沈阳,次年,皇太极登基后将沈阳更名盛京,并按都城规制进行大范围改造。传说为了给盛京赋予江山永固的“铜心”“铁胆”,皇太极下令将全城的铜器店集中于城中心小关帝庙处,铁匠铺则分布于城垣四周,这便有了闻名遐迩的铜行胡同。铜行胡同集中了多少家铜器店已经无从查考,乾隆回盛京祭祖,当地官员因担心铜器店敲打声惊驾,要求胡同里的铜匠停工外迁,当时记载的店铺应为60余家。

铜行里声名鹊起得益于一张小小的奉锣。民国初期,老字号富发诚出品的奉锣风靡一时,供不应求,京津沪的戏班子如果没有奉锣,乐队便算不上标配。加工奉锣是富发诚老师傅的绝活

儿,成语“一锤定音”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。奉锣皆为手工锻制,由徒弟们在胶床上将锣锻制成形,最后决定音色的一锤要由老师傅来敲,刚刚还锣声哑,老师傅几锤下去,锣声立马变得清脆亮丽起来,一张抢手的奉锣由此制成。铜行里的敲打声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时期,各家店铺争先恐后为赴朝参战部队加工军号、徽章、皮带扣、马具等。后来,经过公私合营改革,铜器店先后并入规模更大的国营、集体企业,铜行里的手工业生产模式便淡出了视野。但胡同依然存在,偶尔还有锤鏊之声从胡同里响起,在中心庙的灰墙上激起几丝回音。上世纪80年代,城市改造浪潮风起云涌,古城老旧的街巷被荡涤殆尽,铜行胡同也未能幸免,被彻底地抹去了,只剩一块临街的牌坊在晚照熙熙攘攘的过客。我到中街踏察过,发现这牌坊石新漆亮,没有任何老旧相貌,一问才知这是近年新建的。铜行里原址建了个名曰兴隆大家庭的商业广场,可惜这个兴隆大家庭并不兴隆,一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惨淡状,据说政府已经在考虑新的规划了。

300年铜行里,靠的是师徒传承,靠的是铜心、铜气和铜缘。富化诚铜器店的老掌门规定,到富化诚学徒必须具备三个条件:具铜心,辨铜气,结铜缘。其中辨铜气让我脑洞大开,老掌门的后人解释说,铜与人一样有种看不见的气在,铜匠若不辨铜气,则识不了铜性,达不到人铜合一,做出的器物就会缺少灵气。老掌门认为铜匠要惜铜如命,因为铜不是死材料,而是活生命,铜气是有味道的,与人的体味相近,这恰恰是一种生命的味道。老掌门还认为铜匠传承不单单是传授手艺,传授的还有做人做事的道理。精铜须经九炼,技艺便是时间,铜经九炼不生锈,鏊落千锤始成型,这些铜匠们耳熟能详的话语,透出的则是人生代代无穷已的奥妙。富化诚有关铜的职业理念让我产生了许多联想,的确,人与动物不同,动物生命的全部意义是繁衍,布鲁德蝉在泥土里蛰伏17年,羽化成蝉后只完成一次交配便会死去,而人的生命价值在于传承,传承包含着生命和文化两重含义,对于人来说,生命的血脉和文化的血脉同样重要。从明朝的佛郎机,到清朝的红衣大

打捞,是为了传承

——《铜行里》创作谈 □老藤

炮,再到民国初期的奉锣,沈阳一直保持着绵绵不绝的工匠传承,这种传承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厚积薄发、梦想成真,当家作主的工人们创造了不胜枚举的大国重器,让沈阳有了工业重镇、英雄之城的美誉。

历史是一道痕迹斑驳的时空长廊,吸引眼球的往往是那些价值非凡的器物,而成就器物的工匠却往往名不见经传。沈阳故宫大政殿,是当时盛京城独一无二标志性的建筑,一直被后人所称奇,但大政殿的设计者是谁?主持施工的匠师又是谁?无法找到明确记载。后母戊鼎、西周大孟鼎、毛公鼎,这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出自哪位工匠之手,也没有人知晓。史书上记载的大都是器物的所有者而非创造者,即或像建了赵州桥的李春,除了唐人张嘉贞在铭文中写了一句“隋匠李春之迹也”,再也找不到李春的其他生平文字。我们应该感谢张嘉贞,如果他不在铭记中写下这7个字,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赵州桥是谁人所建,功劳只能记在隋文帝和隋炀帝头上。选择性记录是封建史官的立场所致,这是时代的局限,但史官的缺失,作家可以补位,作家的书写是另一种历史,作家书写的历史不仅有其艺术感染力,而且更有可能是一部史书,因为大多数作家是靠良知在写作。这一点,我们从曹雪芹、鲁迅、巴尔扎克、马尔克斯的作品中都能得到验证。

我努力让自己的笔墨更多地用在“小人物”的书写上。如果说写地位显赫、事业辉煌的“大人物”是锦上添花的话,那么写“小人物”就是一种温情、一种互动、一种躬行。历史有太多被忽略的“小人物”值得书写,他们才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主体。写“小人物”可能不讨巧,但不一定不能传世,《搜神记》里的《韩凭夫妇》就是写的“小人物”,不畏权势双双殉情的韩凭夫妇,今天读来还令人潸然泪下。

我有幸认识了一个值得书写的“小人物”石洪祥。当然,此人已经是著名的工艺美术大师、国内铜雕行业的名家,但我没有把他当大人物来看,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适合书写的“小人物”。石洪祥是铜行里奉锣的最后一代传人,是铜行里铜匠后人的一个代表性人物。石洪祥一直自称铜匠

之子,尽管他毕业于上海美院,有正高级职称,荣获过国家大奖,但他身上一直保持着铜匠本色,他亲自画图、锻制、制模、浇铸,整日弄得铜色满面,他说铜匠本色没法改变,铜气和铜性已经融化到了血液基因当中。石洪祥花费10年时间,依《营造法式》工艺,按十比一的比例复制了一座纯铜大政殿,铜殿每一个构件都可以自由拆卸,他当场给我演示了拆卸门窗、立柱,果然相当自如。我问他为何十年造一殿,有十年之功,会创作多少价值不菲的铜雕,而铜质大政殿如果不出售的话谈不上经济效益。他的回答很简单:就是为了传承,如果不复制,大政殿这种古老的建筑工艺就会失传,复制大政殿,等于给后人留下了一本活教材。我从他的回答中感受到了富化诚老掌门的存在,这是一种难得的责任传承。正是通过石洪祥,我才真正走进了淹没在时光里的铜行胡同,走进了已经消亡的12家铜器店,走进了100个铜匠的精神世界。我觉得人们可以遗忘很多,但不应该遗忘那些成就奇迹的工匠之花,“百工之事,圣人之作”,工匠呕心沥血之作俱是文明的结晶,属于人类应该善待的财富,像奉锣这种地理标志产品,形成不易,理应珍惜,把它从尘封中打捞出来擦拭一新,再度呈献给世人,不啻是文学的一份功德。孔子故里 blocks 匾,上书“金声玉振”四个大字,这金声就是敲击铜钟发出的声音,铜钟奉锣皆发金声,让久违的奉锣金声玉振起来,至少会给生活增添些乐趣。

任何一座古老的城市都是文学的富矿,如同一潭湖水,沉淀着数不清大大小小的“盲盒”。在湖面上荡桨划过固然惬意,若是静坐船头,垂一根钓线来钓沉潜,则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创作《铜行里》之前我问周围许多人知不知道盛京城的铜行胡同,他们纷纷摇头;我又问知不知道享誉全国的奉锣,他们还是摇头,这情形坚定了我写《铜行里》的念头,我要用文学的方式将这段城市记忆打捞出来,让后人记住沈阳城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胡同,尽管它现在已经灰飞烟灭,但在当年,这条胡同就是沈阳心脏中的一条动脉,血脉偾张了三百余载,这动脉里的血,就是铜匠们代代相因的传承。

《下庄村的道路》写作手记

□罗伟章

习惯了以虚构的方式去探寻真实,转而去写报告文学,心里会很不适,最不适的地方,是它直接剥夺了虚构的快乐,同时,把一个“真实”亮给你,反而会引起你的警惕。因此,接到中国作协创研部的电话,让我去写毛相林,我没敢立即应承。那时候,我还不知道毛相林是谁,要先看看再说。我当然不怀疑毛相林已经做出的业绩,我要看的,是从他身上能否梳理出一条精神路径,这种精神为时代所需要,又能遇水搭桥,超越时代,具有贯穿能力。

于是去网上搜索。毛相林得过很多奖,“时代楷模”“最美奋斗者”“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”……但首先让我眼睛发亮的,是他的生存环境。毛相林是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人,下庄村绝壁环绕,类同天坑,他们不叫天坑,叫井,民谣唱:“下庄像口井,井有万丈深。”这让我深感好奇。世界广大,下庄人的祖先,为什么要去那“井”里安营扎寨、繁衍生息?毛相林的主要功绩,是带领下庄民众,在1997—2004年间,修出了一条8公里长的公路,几百年都过来了,为什么现在想到修路?中国的公路有500多万公里,8公里无非是一根草茎,凭什么值得“宣传”?

疑问是探究的起点。对毛相林和他的下庄村,我已有了浓厚兴趣。

再从我自身的层面,我想,作为一名写作者,我究竟了解多少现实里的中国?尽管昆德拉说,小说家有个童年就够了,但那应该是在“缓慢”的时代。当“日新月异”不只是一个成语,还是现实本身,当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不只是一个宏阔的口号,还是坚硬的事实,作家如果不与时代同行,并借助时代的洪流,冲破自身的狭隘,就很难完成对情绪、心灵和人生的真正表达。

采访毛相林,正是我深入现实肌理的一个机遇。

鉴于这两种因素,我说:好,我去。但没立即成行。当时是2020年11月,单位上的工作实在丢不开,准备再过些日子,利用春节去下庄村。正月初三跟毛相林联系,结果又得到一个消息,他获得了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称号,正筹备去北京开会。只能等他从北京回来。2021年2月25日,农历正月十四,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,毛相林作为10位“楷模”之一,第一个上台,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发奖章和证书。这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毛相林的价值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讲话中说:“脱贫攻坚,取得了物质上的累累硕果,也取得了精神上的累累硕果。”

精神的硕果不仅能鼓舞当下,还能传之久远,成为文明的一部分。

二
成都和重庆是近邻,但从成都去下庄村,花了一天半时间。如果没有巫山县政协和县委宣传部提供帮助,还要花更长时间。政协帮我联系了宣传部,宣传部派车,把我从县城送到了村里。巫山县城,未出城即是山,出了城是更高的山,山越爬越陡,四野浓雾弥漫,车在雾里穿行,若不熟悉路况,简直寸步难行。40分钟后,云开雾散,才知道有雾拥抱,倒觉得安全些;

公路很窄,车轮就在悬崖边,陡坡上低矮的灌木,非但不能提供某种保障,还把目力拉下虚隐的深谷。谷的那一边,又是雄强山体,阳光照在石壁上,发出铜质一样的反光。到一处青冈林里,路面钻头似的朝下切割。司机说:从这里开始,就是下庄公路了。

心一直悬着,这时反而静下来,细心观察着路上的一切。某些不起眼的细节,或许能揭示某个深埋的故事。这大约是小说写作养成的思维。但毫无疑问,这种思维自有用处。当我看到一段山色,黑乎乎的,与周边山色不同,马上想到,那里是不是发生过什么?后来问及,果然如此,且是让人揪心又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可能是向下走的缘故,还不停地弯来绕去,目光多被山岩遮挡,下庄公路不如想象中的陡峭和可怖。到一处,司机让下车看看,说有个观景台。出了车门才发现,车在大山的肚腹之中,顶上巨石悬垂。原来,这里万年都是整面石壁,路是从石壁中抠出来的,抠路的工具,是锄头、钎子、铁锤,一寸一寸地凿。没有测量仪器,全靠“土专家”用竹竿和绳子确定方位,几个组分头作业,向中间打通,结果出现误差,上下相距数米。那片黑乎乎的山色,就是这样留下的。

工具简陋到原始,但下庄人用汗水、鲜血和生命,完成了那段路。

观景台上,立着一块石碑,刻着为修路牺牲的六位勇士的名字。

这时候,森森寒气从深谷里涌起,在崖壁间碰撞。向下望,极目处一片坡地,坡地上点染着白墙。那便是下庄村。除了寒风吹拂,听不到任何声音,但分明有一种声音,在时光里复活——热火朝天,奔突呼啸。

而今年已过六旬的毛相林,那时候只有30多岁。

三

毛相林个子矮,他自称“毛矮子”。很明显,他还沉浸在见到总书记的兴奋当中。他先谈了去北京领奖的感受,回忆着总书记说过的话,然后认真地问我:“你说我毛矮子做出了什么成绩,下庄人做出了什么成绩,能得到这么高的荣誉,总书记要亲自为我颁奖?你们这些作家记者,又大都老远跑来采访?”

话题由此深入,一步步回到20多年前。当年的下庄村,出村只有一条便道,便道不便,去那道上走,不仅人会摔死,连猴子也会摔死。1999年有组数据:下庄村398人,几年间,摔伤60人,摔残15人,摔死23人。因此不到万不得已,他们不出村;也因此,未见过公路的有160人,未见过汽车的有210人,未乘过车的有315人。

村里的不出去,村外的也不进来。从县上带个信去下庄,现在一个多小时车程,那时候要走三天,而且还要胆子大,先喝了葡萄酒定心,才敢踏上那条路。

下庄人生活在井里,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井底之蛙。

但他们不觉得,他们认为自己过得很好。

而毛相林作为村干部,去乡上开会,去党校学习,所见所闻让他再也无法安之若素。外面的发展已是百尺竿头,突飞猛进,下庄人却还在以能吃“三大坨”(洋芋、红苕、苞谷)为满足。是的,几百年都过来了,但那是祖先的活法。能用肩膀扛起后

人的,才配称为前人,能在前人的肩膀上站起来的,才配称为后人。他要和下庄村民,从深井里站起来。他对村民们说:“我们已经落后得太远了,再不进步,我们就成原始人了,就要拖新中国的后腿了。”

要站起来、不拖后腿,需要一条路。有了路,才有出路。

可谈何容易!此前,几届村支书率领村民,想把那条人行道疏通一下,不至于上上下下摔死人,也不至于村里有了个病人,费神耗力抬到半途,就断了气,但连修三次,最终作罢。实在太陡了,刨出一块石子,就能一贯到底,踹下河谷。

而毛相林心目中的路,不是人行道,是能跑车的公路。四面石山,绝壁垂落,飞鸟也胆寒,怎么可能修公路?县上的村村通工程,也是将下庄村排除在外的。要修路,只能靠自己。这简直是疯狂的想法。

但毛相林带领下庄人,动手了,修成了。

其中的艰苦卓绝和可歌可泣,我在书里都写了。

四

最初写成的是个中篇,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,主编施战军来信说,他终审的时候,数次“掉球”,深沉的感动,必然凝聚成深沉的精神力量,这是文学的意义。发表不久,在一个会上跟战军见面,他说,你应该写成一本书,让更多人看到。回到北京后,他又向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说起,颜总来电话,说她会找个好编辑来编我这本书,于是又认识了宋辰展。

他们的鼓励和催促是对的,对毛相林和下庄人,我的确还没说够。

修路的时候,毛相林常爱说一句话,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讲话里,引用了那句话:“山凿一尺宽一尺,路修一丈长一丈,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,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。”这太像一个人的口气了。那个人是愚公。愚公移山,这个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寓言,成为了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源头,愚公追求幸福的执着,自力更生的尊严,排除万难勇气,不胜不休的信念,造福子孙的情怀,鼓舞了历朝历代的中华儿女。

毛相林被称为“当代愚公”。

而他,是下庄人的代表。想当年,下庄村的修路人,吃在山上,住在山上,没个平展地方能睡下去,就睡在山洞里,女人睡里面,男人睡外面,睡在最外面的,翻个身就会坠入谷底,摔成肉饼,于是用绳子捆在身上,绳子的一端系住岩石或树干;冬天里,一觉醒来,被子上覆盖着皑皑白雪……

我要更加充分地将他们的精神内涵提取出来。

我鲜明地感觉到,毛相林和下庄人的内在精神,不仅在脱贫攻坚中能发挥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,在乡村振兴以及未



来的日子里,一样光芒闪耀。

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写长篇报告文学,两年前,我深入四川凉山州,写了个比《下庄村的道路》更长的作品,叫《凉山叙事》,发表在《十月》上。我一直在想,当下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不待待见,是因为视角的雷同化和处理的简单化。比如脱贫攻坚,政策大体一致,做法也基本相当,如何写出特殊性,如何尊重人的主体性,不回避矛盾,不绕开人物和生活本身,的确是对作家的考验。当人的主体性消失,就只有报告而没有文学;没有文学,就没有审美,没有感染力,同时也没有更深的真实。

另一方面,作家既要有怀疑的能力,也要有相信的能力。后一种能力往往是被作家忽视甚至被小看的,但事实上,这种能力十分重要。那些堪称伟大的世界名著,无论对人性有多么深刻的揭示,对社会有多么严酷的批判,背后的支撑,正是无比强大的“信”的力量,如同阴影的背后是光。

五

因为有了那条路,下庄村成为巫山县率先脱贫的深度贫困村。如今的下庄村很

漂亮,村道干净、整洁,果园里柑橘正红。毛相林从北京回来,路过县城,就联系了收购商。他既要跟收购商谈,又要召开村委会,安排各项工作,还要和上级部门接洽,因此他很忙。我去下庄,就住在他家旁边,也不是随时能跟他见面。做事,勤勤恳恳地做事,踏踏实实地做事,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,为了他的生命主题。“一个人要做事才能成长”,他说,“不做事,就永远也成长不起来。不组织修路的话,一方面我跟老百姓的血肉亲情肯定不如现在这么深,另一方面,我的观念也很难进步。”

他说的观念进步,不只是说路把他们带到了山外,把山外的人带进了村里,还指科学精神。

当年,路修通了,但下庄村还是那样穷;因为出行方便,下庄人出门打工的多了,见到了外面的世界,家乡在他们眼里,比本身的穷还要穷,穷得一塌糊涂、一文不值,于是纷纷迁往别处。这完全出乎毛相林的意料。修路之前,也有过整村搬迁的动议,县里甚至给他们指了地方,毛相林召开村民大会,举手表决,结果都不愿意搬。毛相林说:“搬迁就意味着给党和政府添麻烦,也意味着要去占别人的土地,都是以种田为生的农民,谁不知道土地的金贵?”这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,是他们舍不得抛下祖祖辈辈生活过来的家园。

毛相林下定决心,发展产业,让下庄村富起来。

他想了很多办法,但每一种办法都以失败告终,因为那些办法都是他拍脑袋拍出来的,是蛮干。

村民受损,让他心里沉痛。不止一次,他向村民作检讨。虽如此,并不是就甘认贫穷,也不是止步不前、无所作为,否则,耗时7年含辛茹苦修出那条“绝壁天路”有什么意义?又怎么对得起牺牲的那六位兄弟?他想在前人的肩膀上站起来,结果不但没能站起来,还把祖宗的坟冢也抛弃了?

痛定思痛,他走进了农业局,走进了农研所,向专家请教。种植名叫“纽荷儿”的柑橘,就是这样请教出来的,而今成了下庄村的支撑产业。

科学精神,正是愚公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。

因此,下庄村的道路,是一条开放的路,指向未来,深含寓意。